

杰克·斯奈德教授访谈录

美 杰克·斯奈德 于铁军

在讲学即将结束时,斯奈德教授欣然接受了本刊编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副教授的访谈,就他本人的学术历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以及新近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要点和发展趋向,坦诚、扼要地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和看法。访谈录由于铁军翻译、整理。

——题记

1 请谈谈您的学术发展道路。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国际关系这一专业?在这方面谁对您的影响最大?能列举几个人吗?

我之所以选择国际关系作为我的专业,部分是因为我的家庭熏陶。我的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我的母亲是学校的护士。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经常围坐在餐桌旁,讨论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问题。我们还到国外旅游,我们甚至在卡斯特罗掌权之前便到过古巴。我们还去过欧洲,这使我对世界产生了兴趣。因此,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对国际局势非常关注。这场战争对我影响很大,我那时正在读大学,参加了各种反战游行和集会。同时,我也开始学习国际政治,试图理解大国到底怎么会陷入一场发生于数千英里之外的丛林战中,并且是在看上去似乎并不关涉重大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介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大学期间,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些极为出色的老师。我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通过考察决策来研究国家对外政策的研究路径正逢其时。所以,我选了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的课。那时候,他是一个试图通过研究官僚政治来理解对外政策的教员群体的头儿。我也选了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的一门课,他当时刚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决策控制论》(*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我还听过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一门课,他那时候正在写关于知觉与错误知觉的心理学的书。这些都是对我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的经验。还有一位老师是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 he 现在是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教授,经常给《国家利益》杂志写稿。那时候他讲授的是一门名为

“比较对外政策”的课程。在这门课上,他向我介绍了比较方法的逻辑,并教会我如何运用历史和比较逻辑来验证对外政策的一般性理论。那门课对我思考如何做研究、如何验证理论非常有帮助。

2 就我所知,1977年您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曾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您提出了“战略文化”这一概念。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其1995年出版的《文化现实主义——战略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大战略》一书中曾对战略文化的研究状况作过一个概览,认为您是第一个创造这一术语的学者。但他在书中也指出,您后来似乎竭力拉开与所谓战略文化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的距离。关于这一点,您能做些说明吗?这一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您后来的想法又有什么变化?

我在兰德公司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苏联战略文化的报告。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我担心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在提出其有限核战争的思想时,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的,即苏联的军事战略家们也会按照美国战略家们所设定的有限核战争的规则来行事。我认为这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从分析上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苏联的战略思维是在一种不同的思想和组织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美国的有限核战争战略是由在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中工作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而苏联的核战争战略则是由军人提出的。这些军人并不把核战争看做是一场以博弈论的方式展开的、为扩大影响力而进行的政治竞赛,而是依据一种传统的打赢一场战斗的军事思想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我认为,如果美国尝试按照博弈论的指导来进行一场有限核战争的话,苏联军官对此根本不能理解,他们会报之以一种大规模的、以赢得战争为目标的进攻。战略文化是我当时所使用的一个术语。我试图以此来概括我所观察到的美国和苏联在对待核战争的态度和思考路径上的不同。

后来,我担心人们套用战略文化这一概念从而把整个社会的态度模式化,而我是以一种更为具体的方式来使用这一概念的。我所考虑的是一套战略观念在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上的起源。这才是我认为人们应该关注的战略文化的来源。我后来告诫人们不要对战略文化的概念做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其动机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

3 现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对“战略文化”这一概念很感兴趣。他们正在思考与美国打交道时中国的战略文化问题。我想,这有可能成为中国战略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如果要我拟定一份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纲领,我不会从孔子或孙子开始。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7.

我会首先提问:从核力量的优劣情况,以及与其潜在敌手相比中国的地缘位置来看,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环境。接下来我会问,那些负责制定军事战略和撰写军事构想的人是谁?他们的职业偏见是什么?他们的组织利益是什么?再接下去我会问,战略环境和制定军事学说的组织环境是怎样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战争思维的。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思考战略文化的比较切实的方法。我会把儒家思想排除在外。

4 在当前的现实主义阵营中,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划分。您的著作《帝国的迷思》被认为是最早对这两种现实主义加以区分的著作。为什么您觉得有必要将现实主义划分为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可以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思考背景吗?

我所关注的是,有些现实主义者夸大了这样一点,即无政府状态本身必然导致国家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具有进攻性。我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该因素促使国家在采取自卫措施时会表现得相当审慎和谨慎,这个因素便是均势。均势起作用时,会惩罚那些过分具有威胁性和进攻性的国家。我认为,像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甚至肯尼思·沃尔兹这样的学者,没有对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采取审慎的防御性行为这一点给予足够的重视。

请允许我就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and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再谈几点。第一点是,我认为,一些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人夸大了这两种思想流派之间的区别。在《帝国的迷思》一书中,我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强大的国家中,扩张主义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非常难以理解。强国剥削和征服弱国,因为这样做常常会带来收益。在这本书中,我所试图解释的并不是扩张主义,而是过度扩张主义,即那些超出了征服会带来收益的均衡点的扩张。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常说,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只为安全关注所驱动,这是不正确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承认,国家征服其他国家并非仅仅出于安全方面的动机,也出于贪婪的动机。但我们发现特别令人困惑、也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有时候国家出于安全的动机也表现得具有进攻性。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会认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在以下方面的大多数论述,即国家之所以采取进攻性政策来保卫自己是因为这是一种必然。正如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指出的,我们确实有意去考察进攻性行为的国内和意识形态起源。

我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争论的第二点说明是,如果你

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仔细读过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你便会发现,他的思考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思想有很多重合之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曾一再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进攻性行为并非国家自卫的最佳方式。尽管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称自己是一名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但他同样也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最佳的自卫战略是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和表现得相对被动。“推卸责任”(buck-passing)的做法便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是被动的旁观者,而其他国家则担负起阻止侵略者的扩张主义行为的任务。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正在交战的两个国家将会两败俱伤,而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国家即便仅仅因为避免了战争损失这一点,也可以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增强。米尔斯海默完全接受了这一点,而这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主要论点之一。同样,米尔斯海默也十分重视“水域的阻遏力量”,即水域屏障给英国特别是美国所带来的防御上的优势。他认为,这使英国和美国这样的离岸大国享有采取一种“离岸均衡”战略的奢侈:它们可以等到威胁变得进一步明朗化,等到谁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以及是否真的有必要采取行动等问题都变得比较清楚时,才介入到冲突当中去。我认为,尽管米尔斯海默表面上强调采取进攻性行动对国家自卫所具有的价值,但如果你仔细阅读他在书中对国家战略动机的分析,你便会发现,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国家保持一种防御性的态势对维护自身的安全是有利的。对于乔治·W·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所采取的进攻性行为,米尔斯海默一直表示反对,这并非偶然。这表明,米尔斯海默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分析胜过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言辞。

5. 有些学者,如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W. Legro)和安德鲁·莫拉夫斯克(Andrew Moravcsik)在《国际安全》上发表文章,批评当代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包括您,还有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等人的研究纲领是一种“退步的”研究纲领,因为他们认为你们的研究已经与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渐行渐远,并且实际上接受了许多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假设,而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是不相容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似乎没有看到您针对这两位学者的批评的回应文章。

是的,我没有写回应文章。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十足的沃尔兹式的现实主义者。我一直是一个折衷的现实主义者。我接受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某些假设,包括无政府的逻辑,甚至包括国家至上的假设。但我一直认为,国家之间的国际无政府逻辑并不是驱动国家行为的唯一因素。在许多情况下,这也不是驱动国家行为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也极为重要,就像我在《帝国的迷思》中所讨论的。所以,尽管我吸收了像沃尔兹这样的新现实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但我却从不认为将这些思想与其他概念结合起来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实际上,我与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较早时候认为我们的分析在理论上是一种“退步”的批评作了回应。我们试图说明,我们所使用的不同的带有折衷性的研究路径,如何可以成就逻辑上一致的理论。

6 在《帝国的迷思》一书中,您所指称的“现实主义的解释”在我看来似乎指的是沃尔兹式的现实主义解释。您对那种现实主义提出了批评。但按照我的理解,沃尔兹本人基本上也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正确。当您在《帝国的迷思》中使用“现实主义”这一标签的时候,您指的是沃尔兹式的解释吗?

我认为沃尔兹基本上是一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因为他把均势描述成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当其发生作用时,最强大的和最具进攻性的国家将遭到由受其威胁的较弱小的国家所组成的联盟的惩罚。这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本洞见,并且这一洞见正是来自于沃尔兹。但沃尔兹的表述是模糊的,因为他也谈到无政府状态本身造就了国家进攻的诱因。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将导向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方向。沃尔兹本人反对越南战争。沃尔兹的政治学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政治学非常相似。他的理论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而且他的学生也是一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比如说斯蒂芬·沃尔特、斯蒂芬·范埃弗拉……

还有巴里·波森(Barry Posen)?

巴里·波森比较难以归类。就我所知,波森并不寻求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标签。他是一个聪明的现实主义者,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许是。

7 近些年来,现实主义阵营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即所谓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些学者,如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曾将你划归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支中,而您曾经对我说您是一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在您看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有的话,主要区别又在哪里呢?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可以是新现实主义者,如斯蒂芬·沃尔特,也可以是古典现

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Progressive Research and Degenerative Allia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19—922. 该文是对约翰·瓦斯克斯的批评文章的回应。瓦斯克斯的批评文章,参见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912.

现实主义。在我看来,使新现实主义者与其他流派的现实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不是进攻抑或防御,而是要看这位现实主义者是否试图保持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演绎逻辑。例如,斯蒂芬·沃尔特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所有人都把他归类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表现得过于具有进攻性的大国将会遭到惩罚,因此,做一名离岸均衡者是更为明智的选择。他还反对预防性战争。所以,他绝对是一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但他却是一名防御性的新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努力保持沃尔兹的基本的演绎逻辑。他自己的“威胁均衡理论”最好被看做是对沃尔兹理论的发展,或者说是这一理论的澄清抑或调整。

相反,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不管他们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与沃尔兹的理论拉开了距离。他们不情愿把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逻辑置于如此之高的位置。他们更愿意用一种比较松散和一般的方式来讨论权力政治、地理,以及通过国内政治而表现出来的战略观念的发展。沃尔兹和沃尔特的新现实主义试图保持自己作为一种以国际无政府结构为论证起点的严密的演绎理论,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思维框架则比较松散。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关注国际层次上的权力政治,但并没有一个具有严密的演绎逻辑的理论框架。它还以一种折衷的方式来讨论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塑造国际层次上的权力政治思维的问题。这都是非常不同的思想风格,并且有时候它们会得出不同的实质性结论。但是,由于像均势这样的概念为每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共有,所以在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之间也有一些重合的地方。

8 您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其主要优缺点是什么?

我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新现实主义的优点在于,它力图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理论假设,并且其演绎推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推动理论和概念发展的发动机,并将国际关系领域导向一个论证更为严密的方向。但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假设的简约性自然也导致了它在激发思想方面的局限性。当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对外政策时,它便使现实主义者穿上了一件紧身衣。沃尔兹自己曾经说过,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并不是一种对外政策理论,你可以运用这种理论来理解某些非常普遍的、非常宽泛的模式,如为什么战争总会爆发,但你无法运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个星期二做了它所做的事。沃尔兹说,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种对外政策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优势是,他们所面对的概念菜单的选择范围要更广。这些概念以一种更为松散、自由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可以根据理解某种特定情况的需要而将其加以组合和重新组合。这种思维框架经常可以产生良

好、有趣并且具有创造性的结果。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著作是科林·迪克 (Colin Dueck)对 20世纪美国大战略的分析。书中对权力、地理、国内政治和国内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做了折衷。他分析了四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以及它们在 20世纪是怎样随着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发展而兴衰变化的。我认为他的历史解释非常令人信服。尽管这部著作阐述的是事实,但它并非仅仅是描述,因为迪克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使用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般框架。

在我看来,挑选何种研究路径,可能取决于你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更想用细节和事件的微妙之处来说明一个具体案例或历史时期,那么新古典现实主义便具有某些优势。而如果你想以一种严密的方式来研究基本的理论问题,那么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建构起来的理论对你将更有帮助。

9. 让我们把问题再拓宽一些。您对未来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纲领有什么看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之间的论争在中国已有很多讨论,但学者们似乎对下一步的研究该怎么展开、该向哪个方向推进有一些困惑。在这方面,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情况怎样?

我认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种主要范式,无论从理论方面来看还是从基于理论的经验著作来看,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由于现实主义理论没能够预测到冷战的结束,也由于抱有理想主义的人认为,现实主义思想有助于一个为他们所不喜欢的世界体系永久性地存在下去,现实主义理论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现实主义仍然显示出令人吃惊的灵活性和持久性。许多人相信,现实主义的基本洞见是正确的。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在克服障碍与回应批评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即使不是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声音,它至少也仍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声音。

自由主义拥有被杰克·列维 (Jack Levy)称作是我们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所拥有的唯一规律——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打仗。这一度是一个最具活力的研究纲领。未来它仍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纲领,不过,我认为它已经丧失了某些发展的动力,因为现在它已经完成了它需要完成的大量基础工作。它已经确立为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

建构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以及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利益,最终都是由观念和信念所构建的。在这方面,建构主义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被许多现实主义者 and 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吸纳,因此建构主义者在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他们所提倡的某些基本观点上已经赢得了胜利。在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建构主义者已经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带有独特和清晰预测的、强有力的、经验性的研究纲领,像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那样。事实上,建构主义者已经趋向于与主流的研究路径合流。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出了他们最重要的贡献。

尽管这三大范式仍将持续下去,国际关系领域就其总体而言正在脱离基于范式的分析。较为年轻的学者已经厌倦了范式。在他们看来,这些范式都是片面的,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对关于哪一个大理论将会解释所有问题这样的争论不怎么感兴趣,而对解决特定问题更感兴趣。他们想知道怎样才能动荡的社会中阻止内战的发生。他们想知道怎样才能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他们想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权力政治思维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就乐于借鉴现实主义。如果创建制度可以有所帮助,他们就乐于借鉴新自由制度主义。他们不玩最喜欢的。他们是折衷的。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有一些研究路径并非基于范式,或者说并非基于传统的范式,但却引起许多关注,并被认为是成功的。其中之一是关于战争和冲突的“讨价还价学派”(bargaining school)。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最先使之广为人知。这一研究路径正在产生许多好的成果。我发现许多年轻人试图运用这一路径来研究内战中的干涉和调停问题。另一个很有活力的领域是运用统计方法来研究冲突。其实践者既考察权力变量、政体类型变量和经济变量,也考察意识形态变量和认同政治。他们通过统计分析来观察这些变量中哪一个最重要。这些统计分析常常是在意识到各种范式的不同视角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进而从经验上考察,在这些变量中,究竟是哪一个实际上造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结果。我预计,未来会有更多这种走中间路线的著作和基于问题的著作问世,而非范式导向的著作。

10 我注意到,在您这一次来北京大学所做的三次讲座中,关于理论方面的题目是“当代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您在您所讨论的国际关系理论前面加上了一个“美国的限定。这使我想起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属性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来自美国,有人称此为美国的“知识霸权”。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有些学者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但也有学者认为,理论就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应该少谈“特色”。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当我在国外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说明我所谈的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对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加以限定,就像有些学者可能会谈论“2001年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样。

我认为,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理解为提出普遍适用的假设,是最为有用的。真理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是一样的。当然,政治行为随国家或时段的不同而

不同,所以理论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因果条件会导致不同的行为,而因果条件的变化是可以通过某种一般连续统 (general continuum) 上的不同的点来表现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学术共同体可以通过国家、世代或者对个人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经历等来加以界定——常常会研究不同的问题,参与不同的论争,以及从事不同的研究议程。而这些问题、论争和研究议程之所以指向不同的方向,则是由于当地的迫切关注不同所导致的。

虽然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非常努力地试图制造出各种一般性的论说——这些论说可以通过运用客观数据进行复制的方式来加以验证——但毫无疑问,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所提出的问题的种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专家和来自欧洲移民的学者对美国公众及战争期间的政治家所表现出来的墨守成规、幼稚和动摇不定的态度深表不满,现实主义即产生于此。自由主义显然也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生活。尽管如此,值得指出的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在国际关系学者当中并没有多少追随者,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事实已经表明,民主国家像非民主国家一样喜欢战争。只是等到迈克尔·多伊尔 (Michael Doyle) 指出从来没有发生过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一点之后,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并引发了一个精致的、持续的证明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多个方面与其他类型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同的研究纲领。在这里,塑造美国的理论议程的是事实,而非仅仅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许多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将“大国的和平崛起”问题加以理论化的工作感兴趣。这是一个在不同国家都引起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兴趣的一般性论题,但是中国学者对于这方面的论争可以提出一些新的假设,因为他们居于特别有利的位置,这种有利位置能够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促使他们提出新的思想。不过,这些假设应该是可以依据证据来加以检验的。证据会使中国以外的学者相信这些假设的有效性。

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看到不同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仅仅成为对各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学者应该是社会的批评者,他们应该手把镜鉴,真实地、有时是不讨人喜欢地反映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便没有任何人会这么做。